

日本所藏

稀見中國戲曲文獻叢刊

第一輯 第一冊

黃仕忠〔日〕金文京〔日〕喬秀岩 編

237
29
1

黄仕忠 [日] 金文京 [日] 喬秀岩 編

第一輯

第一冊

日本所藏稀見中國戲曲文獻叢刊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本書出版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日本所藏稀見中國戲曲文獻叢刊. 第1輯/黃仕忠,
(日)金文京,(日)喬秀岩編. 一影印本. 一桂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6.12
ISBN 7-5633-6194-4

I. 日… II. ①黃… ②金… ③喬… III. 古代戲
曲—劇本—作品集—中國—叢刊 IV. I237-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6)第 067318 號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廣西桂林市中華路 22 號 郵政編碼: 541001)
(網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肖啓明

全國新華書店經銷

廣西師範大學印刷廠印刷

(廣西桂林市臨桂縣金山路 168 號 郵政編碼: 541100)

開本: 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張: 583 字數: 4500 千字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價: 9800.00 元(全 18 冊)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 影響閱讀, 請與印刷廠聯係調換。

前言

日本所藏中國古籍之繁富，久爲國人所知。自近代以來，黃遵憲、楊守敬、盛宣懷等人在日本訪購中國古籍，所披露之唐鈔、宋刻、元槧，驚艷於世。楊氏並協助黎庶昌編刊《古逸叢書》（光緒十年，一八八四），使許多失傳古籍得以重返故土，又編印《留真譜》（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以存宋元舊版之貌。其後董康、傅增湘等人在京都、東京等地目睹許多珍稀典籍，見於所著《書舶庸譚》（四卷本，武進董氏影印，一九二八）、《藏園群書經眼錄》（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三）等書。且董康於傳統典籍而外，關涉戲曲小說，開一時之風氣。隨後孫楷第、傅芸子曾前往東京尋訪戲曲及通俗小說，有《日本東京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北平圖書館，一九三二）、《東京觀書記》（《白川集》，東京文求堂，一九四三）等問世。同時，日本學者於日本所藏戲曲，亦間有介紹著錄，如長澤規矩也有《日本現存戲曲小說類目錄》（一九二七年《文字同盟》第七號）、《家藏舊鈔曲本目錄》（一九三五年《書志學》四卷四號）、《家藏曲本目錄》（一九三七年《書志學》五卷五號）、《家藏中國小說書目》（一九三七年《書志學》八卷五號）、《家藏曲本小說目錄補遺》（一九三九年《書志學》十三卷一號），並有手定《雙紅堂文庫分類目錄》（東洋文化研究所，一九六二）；神田喜一郎有《鬯齋藏曲志》（《神田喜一郎全集》第四卷，京都同朋舍，一九八六）等。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慶應大學斯道文庫的阿部隆一教授嘗有編集日本所藏漢籍總目之動議，戲曲、小說兩類總目之編纂，亦列入計劃之中。後小說之部由大塚秀高氏完成，題《增補中國通俗小說書目》（東京汲古書院，一九八七），而戲曲之屬則未及措手。故日本所藏中國戲曲之概貌，迄今尚不得而知。

筆者於二〇〇一年四月至二〇〇二年五月，赴日本創価大學作訪問研究，蒙該大學之關照，得以將主要精力，用於訪曲。承許多日本學者的幫助，但凡收藏戲曲重要之所，大多得以造訪，並逐冊檢核，歸而編集爲《日本所藏中國戲曲綜錄》。此錄雖尚非日藏戲曲之全貌，但已可概見其大要。又細審所覽、所知之明刻、舊鈔，從中選擇孤本及稀見之本凡八十餘種，擬予影印。蒙京都大學金文京教授、東京大學喬秀岩助教授（現轉任教北京大學）襄助，經多方籌措，轉輾兩家出版社，歷時三載有餘，茲編第一輯，方獲出版許可而得以問世。茲於卷首綴以贅語，以介紹日本學者研究、收藏戲曲之經歷，以及重要曲籍之收藏源流，以便讀者瞭解二十世紀前期日本中國學界戲曲文獻收集與研究之概況。

一

日本所藏中國戲曲，究其來源，大略出於二途。一是明末以降，日本結束將近二百年的戰亂，而進入世局穩定、文化繁榮的江戶時代，因幕府及各地藩主對小說戲曲之嗜好，而從江南輸入。只是戲曲不如小說之可讀，故而當時人們所喜愛者，實爲書冊中精美之插圖，傳至今日，均已成爲稀世之珍。二是二十世紀前期，因西方學術觀念的引入，加上王國維等人的影響，日本學者開始關注通俗之戲曲小說，不唯盡力收集從日本舊藏家散出之戲曲典籍，而且借赴中國留學、公幹之機會，着意收羅俗曲唱本，於明版清刻之外，亦遍採名家稿鈔及書坊、藝人之舊鈔，雖殘紙剩葉，亦以爲寶。由於日本學者在戲曲研究方面的起步並不晚於中國本土，且搜羅甚勤，細大不捐，於今觀之，眼界之大，尚在當時中國一般學者之上。

日本學者具有近代學術意義的戲曲研究，始於明治時代。

一八八七年，幸田露伴（一八六七—一九四七）、森鷗外（一八六二—一九二二）、森槐南（一八六三—

一九二一）等在《醒醒草》第二十卷上共同研討《水滸傳》的作者問題，涉及元雜劇和明代小說等方面，首次把通俗文學提到與傳統經典等同的地位，並作為學術對象加以研究。

一九九一年，森槐南發表《西廂記讀方》（《帝國文學》）；柳井絅齋刊出《桃花扇梗概》（《早稻田文學》）。

一九九三年，野口寧齋撰《吟風閣》詩曲梗概》（《早稻田文學》）。

一九九四年，幸田露伴發表《元時代的雜劇》，介紹十四部元人雜劇（《太陽》第一卷）；岡島獻太郎譯述的《西廂記》二卷活版印行（東京，岡島長英刊行）。

一九九五年，幸田露伴發表《歸元鏡》解說》（《太陽》）。

一九九七年，笹川種郎（一八七〇—一九四九）出版《支那小說戲曲小史》（東京東華堂），是為最早的中國小說戲曲專史。《太陽》第三卷刊出笹川種郎的《支那的戲曲·李漁〈閒情偶寄〉》、森槐南的《牡丹亭抄目》。松久定弘出版《獨逸戲曲大意（附清國雜劇扮裝圖）》（東京博聞社）。

一九九八年，阪本晃峰出版《西廂記譯解》（東海義塾《支那小說譯解》第二冊）；田中從吾軒譯《西廂記》（早稻田講義錄）；笹川種郎出版《支那文學史》（帝國百科文庫之一，東京博文堂），其中《金元文學》篇中，首列「小說與戲曲之發展」一章，是為中國文學史著作中最早的小說戲曲專章。笹川種郎超越了日本江戸儒學和明治漢學，把中國小說戲曲之研究，帶入近代學術之行列，成為日本的中國俗文學研究的一個嶄新起點。

一九九九年，森槐南在東京帝國大學講授詞曲，講解《西廂記》，並把元曲列為重要參考讀物。久保得一（一八七五—一九三七）說：「森槐南博士為明治時代詞曲研究的開山。在研究的同時，甚至試圖創作。」

森槐南撰有《補春天》傳奇，刊於明治十三年（一八八〇），署槐南小史，近人莊一拂著《中國古典戲曲存目彙考》有錄，誤以為中國人所作。

一九〇一年，幸田露伴發表《中國第一戲曲之梗概》，介紹《琵琶記》；久保得二發表《詞的發展及其變遷》，敘及戲曲（《帝國文學》）。

一九〇三年，鹿島修正出版《評釋西廂記》（東京：青木高山堂）；久保得二撰成《支那文學史》（早稻田講義錄），有部分篇章介紹戲曲。

一九〇四年，宮崎來城完成《支那戲曲小說文釋鈔》（早稻田講義錄），含《西廂記》、《桃花扇》。

一九〇六年，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成立。狩野直喜受聘主持「中國哲學講座」。

一九〇七年，內藤湖南受聘於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開設東洋史概論；兩年後，主持「東洋史第一講座」。狩野直喜兼任中國文學講座教授，直到一九二八年退休，「元曲」為其講座內容之一，他每年都要講授幾篇元雜劇作品。

一九〇八年，森槐南在《漢學》雜誌上連載《元人百種解題》。王國維完成《曲錄》。

一九〇九年冬，鹽谷溫赴長沙從葉德輝學南北曲，直至一九一二年夏回國。王國維出版《戲曲考原》。

一九一〇年，狩野直喜、鈴木虎雄在京都帝國大學共同主持中國文學講座，講解元曲。狩野直喜在《藝文》雜誌上發表論文《水滸傳與中國的戲劇》，為一八九七年開始的《水滸傳》的作者問題的討論作了定論，考定《水滸》戲早於小說。鈴木虎雄撰《王氏的〈曲錄〉及〈戲曲考原〉》，介紹王國維戲曲研究的最新成果。是年八月，內藤湖南、狩野直喜等五人專程赴華北，滯留五十餘日，以追蹤斯坦因、伯希和劫後的敦煌遺書，訪內閣大庫，晤王國維、董康等，並獲若干戲曲文獻。

一九一一年，大阪《每日新聞》上連載狩野直喜《論支那戲曲——以〈琵琶行〉為材料》以及西村時彥譯介之《西廂記》。狩野直喜在《藝文》二、三號上連載《元曲的由來與白仁甫的〈梧桐雨〉》。津田左右吉（一八七三—一九六一）發表《雜劇與能》（《東洋學報》第一期）。京都山田茂助用元曲選本排印出版《元雜劇二種》（《漢宮秋》、《竇娥冤》）。

是年六月，青木正兒師從狩野直喜，以《元曲研究》一文，成為京都帝國大學中國哲學文學科畢業的第一個學生。

是年秋，狩野直喜赴歐洲游學二載，考察被劫之甘肅、新疆等地文獻，首先提出「敦煌故事」（即「變文」）的存在，判定以話本為中心的中國俗文學萌芽於唐末五代；又將彼得堡所見科茲索夫劫掠之甘肅黑水城文書中的《劉知遠諸宮調》殘卷，認定為元曲之來源。

是年十月，辛亥革命爆發，清王朝被推翻。歲末，因京都大學內藤湖南、狩野直喜等人的邀請，王國維隨羅振玉流亡日本，居住在京都東山淨土寺町，長達五年。

一九一二年，王國維在京都完成了奠定中國戲曲史學科基礎的《宋元戲曲考》。此後之研究轉向了史學。他的曲學與史學研究，及其與京都學者的長期交往，對京都學派的形成，具有重要影響。

其時，東京大學將中國文學從「漢學科」中分離出來，從而確立了新的學術分野。是年夏，鹽谷溫從長沙回國，主持東京大學「中國文學講座」，講授《支那戲曲讀講》，以此為標誌，日本學界對中國文學的研究，進入了近代學術的行列。

一九一三年，西村時彥出版《南曲琵琶記（譯本琵琶記）附支那戲曲論》（自印本），王國維作序。

一九一四年，由狩野直喜主持、據羅振玉舊藏覆刻的《元刊古今雜劇三十種》（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

叢書第二卷）問世；金井保三、宮原平民譯《西廂歌劇》出版（東京文求堂）。

至此，以京都大學與東京大學為重鎮，日本之戲曲研究已成氣候，戲曲文獻的收集則成為學者共同的興趣與目標，進而迎來日本中國戲曲研究的鼎盛時期。二戰之前，重要的戲曲研究著作有鹽谷溫《支那文學概論講話》（東京大日本雄辯會，一九一九，所述以戲曲小說為中心）和《元曲研究》（博士論文，一九二〇）、久保得二《支那戲曲研究》（東京弘道館，一九二八）、青木正兒《支那近世戲曲史》（東京弘文堂，一九三〇）和《元人雜劇序說》（東京弘文堂，一九三七）等。戲曲翻譯著作有今關天彭（一八八四—一九七〇）《支那戲曲集》（東京東方時報社，一九一七），鹽谷溫譯《西廂記》、《桃花扇》，宮原平民譯《琵琶記》（《國譯漢文大成》第十一冊，一九二一），及鹽谷溫譯《燕子箋》和《長生殿》（《國譯漢文大成》第十七冊，一九二三）等。鹽谷溫率弟子經過多年的努力，於一九三二年完成《元人百種曲》的翻譯，其中《楚昭公》、《漢宮秋》、《殺狗勸夫》三種曾在一九三二年、一九三三年以鹽谷溫名義出版（《國譯元曲選》後刊於一九四〇年，東京目黑書店）。一九二八年前後，鹽谷溫主持完成了《嬌紅記》、《橘浦記》、《西遊記》等曲本之影印或排印工作。

王國維於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一二年間，致力於古代戲曲研究，撰成《曲錄》、《戲曲考原》、《唐宋大曲考》（以上三種刊於一九〇九）、《古劇脚色考》（一九一一）、《宋元戲曲考》（一九一二）等著述，從而為現代學術意義上的戲曲史學科的建立奠定了基礎。但如上文所示，早在王國維開始戲曲研究之前，日本漢學界對於戲曲的研究，已經蔚然成風。在王國維的系列著作問世之後，日本學者之戲曲研究與之同聲相應，並以京都大學和東京大學為研究重鎮，蔚為大觀。日本近世戲曲收藏大家，多為東京大學或京都大學的學者

或學生，亦是這一背景下的自然結果。

王國維推崇元曲，視明傳奇為「死文學」，認為其無足稱道，這雖為他個人的一家之言，但也非憑空而語，而是有著文獻作支持的。他居風氣之先，收羅了大量明刊傳奇文本，故其觀點實為有所見而述。王國維的戲曲舊藏現在已經不可復原，但通過日本之收藏，尚可略見一斑。其中經過，令人喟歎。

大谷大學藏明末朱墨套印本《西廂記》原為王國維舊藏，第四冊有內藤湖南識語：「丁卯六月，王忠愍公自沉殉節，滬上蟬隱主人售其舊藏以充恤孤之資。予因購獲此書，永為紀念。九月由滬上到。炳卿。」大約在一九一三年前後王國維轉向史學研究，其戲曲舊藏多交羅振玉之弟羅振常。一九二七年觀堂自沉於頤和園，經營書籍的蟬隱主人羅振常將王之舊藏公示出售，以恤其孤。由於時局動盪，未見中國學者有將王氏舊藏收購的動議，而日本學者多因敬重王氏之學，越洋認購，其中有內藤湖南、狩野直喜、鈴木虎雄、久保得二、神田喜一郎、倉石武四郎、吉川幸次郎等人，故今日日本學人文庫內或可見一兩種鈐有「王國維」印的戲曲文獻。以觀堂之識見，所聚者自必有其佳處，於今檢視，均屬孤本或稀見之本。這是較晚從中國學者手中流徙日本的最重要的一批戲曲文獻。

因此，王國維以其著作與藏書，直接影響了日本學者之戲曲研究與收藏，這是現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的一個重要內容。鹽谷溫說：「王氏遊寓京都，我學界大受刺激。」此後，日本中國戲曲研究的成果，浸浸然有超越中國本土之勢。鹽谷溫、青木正兒等人的著作，對中國二十世紀中葉的文學研究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鹽谷溫的著作，有陳林蘇譯本《中國文學概論》（北京樸社，一九二六）；又有孫俚工譯本，題作《中國文學概論講話》（上海開明書店，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已印至五版）。青木正兒的《中國近世戲曲史》，有鄭震節譯本（上海北新書局，一九三三），又有王古魯全譯本（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六）；又有增補修訂本，

中華書局，一九五四）；《元人雜劇序說》有隋樹森譯、徐調孚校補本（上海開明書店，一九四一）；《中國文學概說》亦為隋樹森所譯（上海開明書店，一九三八）。

二

日本今藏中國戲曲珍籍最富之處，當推東京大學、京都大學、天理大學、大谷大學、東北大學及內閣文庫、宮內廳書陵部等。這些學府所藏，與近代日本中國學發展史密切相關。而內閣文庫與宮內廳書陵部等之所藏，則出自幕府與各地藩主，並可以溯源到江戶時代。

內閣文庫的歷史，源遠流長。它準確的稱呼應是日本國家公文書館第一部。今姑依學界習慣的稱呼。作為日本國家圖書館之一，內閣文庫是日本收儲漢籍最多的藏書機構，冠於各公私文庫。其中，戲曲之收藏也令人驚歎。這些戲曲文獻，主要源自楓山官庫與昌平坂學問所，與德川幕府緊密相關。

楓山官庫，是幕府大將軍的主要藏書庫。始建於慶長二年（一六〇二）。是年，在經歷了近二百年的內戰之後，德川家康以武力確立了對政局的控制，迫使天皇任命其為「征夷大將軍」，駐屯江戶城（今東京），從而作為第一代大將軍開啟了長達二百五十年的由德川家族統治的江戶時代。德川家康於武功之外，尤喜文翰，並以武功文治為基本國策，禮遇宋學大師藤原惺窩（一五六一一一六一九）及其弟子林羅山等，後延請林羅山為幕府大學頭，以日本化的中國宋學作為官方的意識形態。德川家康在江戶的富士見亭所設文庫，被稱為「富士見亭文庫」。一六三九年，文庫遷往紅葉山，故名「紅葉山文庫」，也寫作楓山文庫。因係幕府大將軍的書庫，故也稱楓山官庫。

德川家康建立文庫之後，廣泛徵集日本已有的古本，例如著名文庫「金澤文庫」的舊藏書，又命各地藩主進獻，以充實庫藏。更多的書籍，則是通過設在長崎的「海關」為幕府購置的。這也是當時鎖國背景下的唯一通商口岸。幕府不僅得以瞭解最新書籍情況，並且擁有優先處置權。文庫歷經數代，不斷增加收藏，質與量均有極大的提高。特別是在德川吉宗積極獎勵學問的享保年間（一七一六—一七三五）及近藤重藏出任書物奉行的文化文政年間（一八〇四—一八二九），文庫更是取得驚人的發展。幕府末年其藏書已達十萬冊，其中七萬三千餘冊是中國書籍。內容包括經學典籍、史籍、文集、政書、醫書乃至戲曲、小說等，品類至為豐富，留存至今，不乏天下孤本。

紅葉山文庫在日本明治初年歷經太學、太史局等機構管轄，明治六年（一八七三）由太政大臣接管。明治十七年（一八八四）定名為「太政官文庫」，並彙集各官廳之舊藏，遂成日本政府之中央圖書館。次年廢太政官而創內閣制度，文庫也改名為「內閣文庫」。

以其所存戲曲劇本為例，出於楓山文庫的，有明葉憲祖的《三義記》、《渭塘夢》、《琴心雅調》和《易水歌》，題孫鑛評的《硃訂琵琶記》，以及富春堂刊本《琴心記》、明臧晉叔刪改定批評屠隆所作之《曇花記》、凌氏朱墨本《明珠記》、明末烏衣巷刊本《花筵賺》、耐閒堂刊本《西樓夢》、繼志齋之《重校琵琶記》與《重校北西廂》合刊本。這些大多是孤本傳本，或此外僅有一兩處保存者。又如明末朱墨印本《繡襦記》、凌氏朱墨本《紅拂記》、明泰昌間朱墨刊本《牡丹亭記》、《紅梨記》，則與《古本戲曲叢刊初集》所收各劇之底本屬同一版本。

又有戲曲選本甚夥。如明黃文華編選的《八能奏錦》和《詞林一枝》、景居士編選的《玉谷新簧》、龔正我選輯的《摘錦奇音》，均為孤本傳本，臺灣王秋桂主編之《善本戲曲叢刊》實據以收錄。此外如鋤蘭忍人

編輯的《玄雪譜》、明張琦等編選的《吳騷合編》、程明善編集的《嘯餘譜》及沈泰編選的《盛明雜劇》二集，亦為稀見之物。

昌平坂學問所的藏本，源出於幕府初期漢學巨擘林羅山及其後十代人的舊藏。

林羅山（一五八三—一六五七），名信勝，字子信，法號道春，江戶時代著名的漢學家，也是日本漢學史上一位極其重要的學者。師從藤原惺窩，精於朱子之學。他出任幕府大學頭後，將中國儒學文化，從以前漢學家的「修身齊家」，擴展而至「治國平天下」，使朱子學成為官方哲學，影響極為深遠。

昌平坂學問所是幕府的教育機構，亦稱昌平黌，原是林羅山於一六三〇年在上野忍岡開辦的書院。一六九〇年移至聖堂（湯島），成為林家的私塾。一七九七年改為幕府官立學校，稱「昌平坂學問所」。林家藏書全部被移交保管於此，學問所同時也大力開展搜集書籍工作。一八四二年設立新刊書上交制度，獲得許多大名、學者捐獻之書。至天保年間（一八三〇—一八四三）書庫已達四棟之巨。昌平坂學問所的藏書在明治元年（一八六八）由大總督府接管，後改由文部省管轄，在明治五年（一八七二）移入新建於湯島的書籍館，明治八年（一八七五）全部遷入國立淺草文庫，故鈐有「淺草文庫」藏書章。明治十七年（一八八四）合併入太政官文庫，次年太政官文庫改名內閣文庫。

「昌平坂學問所」舊藏戲曲，也可概見林氏數代人的共同努力。如明刊程明善編《嘯餘譜》、明萬曆二十年熊氏忠正堂刊《重刻元本題評音釋西廂記》，均有「江雲渭樹」印章，乃林羅山舊藏；明萬曆刊本《雜劇三種》（含《新刊鬱輪袍雜劇》、《新刊杜祁公看傀儡雜劇》、《新刊葫蘆先生雜劇》、明王衡撰）、明獨深居刊本《玉茗堂傳奇》等，鈐有「弘文學士館」章，則出自林恕的舊藏。林恕（一六一八—一六八〇），號

鵝峰，林信勝第三子，一六六三年，幕府授林氏家塾「弘文學士館」稱號。林羅山舊藏熊氏刊本《西廂記》，今僅見日本藏有兩部。林恕藏王衡雜劇三種，當為王氏全集之附刻，亦為孤本。《葫蘆先生》且無別本流傳。

此外，茂林葉氏重刊本《新刻王狀元荆釵記》、清初竹林堂刊《玉茗堂四種》、康熙刊《笠翁十種曲》、乾隆刊《綴白裘》、明刊清代改板印刷王驥德《新校註古本西廂記》、清文德堂刊《繪像第六才子書》等，當係昌平坂學問所陸續購藏者。其中《新刻王狀元荆釵記》為孤本，對於研究《荆釵記》在明代的流傳有重要價值。

源自毛利高標的藏本，也甚可觀。毛利高標（一七五五—一八〇一），字培松，是九州豐後佐伯藩（二萬石）的第八代藩主，以博雅著稱。性耽圖書，藏書多達八萬餘卷，幾乎均從中國直接舶載而來。因其擅長版本品鑒，故多珍品。如其舊藏明末刊本《新刻點板樂府南音》二卷，明洞庭簫士編，為世間孤本，王秋桂《善本戲曲叢刊》第五輯據以影印；又有明刊《太和正音譜》三卷，亦為珍籍。其書鈐有「佐伯侯毛利高標字培松藏書畫之印」。一八二八年，其孫出雲守毛利高翰將其書一萬七千餘種進獻給江戶幕府，分藏於楓山文庫、昌平坂學問所及醫學館。三館在明治維新中，皆歸內閣文庫。如此分久而復得相合，亦是罕見的幸事。

宮內廳書陵部，舊稱圖書寮，始設於八世紀。所儲為歷代天皇御覽之物。至一九四九年，圖書寮移歸「宮內廳書陵部」。宮內廳是日本內閣的一個部分，司職天皇家族和宮廷事務。「書陵部」是管轄皇家文獻典籍和陵園的部門，其中珍藏多為宋元刊本，是日本收藏珍貴中國古籍最多的地方。其中不僅有歷代皇室舊藏

之禁內圖書，且有諸親王、江戶時代大名（諸侯）的貴重圖書與原侯爵、伯爵、子爵世襲圖書以及歷代學者的珍藏。一八九一年，內閣文庫將包括德川家藏楓山官庫圖書在內的本庫所藏最貴重圖書三萬餘冊，移交皇宮，「永世保存」。故書陵部中貴重之物，舉世無匹。而戲曲文獻多出自明清以後，能入皇宮法眼者，自非俗物。今見於圖書寮目錄的戲曲文獻有以下幾種：

《容與堂六種曲》，八冊，明李贄批點，明萬曆三十八年（一六一〇）虎林容與堂刊本，黃應光鐫，含《玉合記》二卷、《幽閨記》二卷、《會真記》《蒲東詩》各一卷、《紅拂記》二卷、《西廂記》二卷。

《傳奇四十種》八十四卷，八十冊。《圖書寮漢籍善本書目》卷四附註：「是書所收，三十三種係汲古閣六十種曲本，其餘七種曰西遊記，曰橘浦記，曰玉簪記，曰療妒羹，曰新灌園，曰量江記，曰酒家傭。蓋書賈將諸曲零本拉雜排纂，漫題《傳奇四十種》者。橘浦記，明許自昌撰，題勾吳梅花墅編；西遊記，題元吳昌齡編，並係萬曆刊本，尤可珍貴。每冊首有『明倫館印』『德藩藏書』印記，男爵毛利元次所獻。」按：《西遊記》、《橘浦記》兩種為世間孤本。

《元曲選》十集，四十冊，明臧懋循輯，萬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序雕蟲館刊本，有「明倫館印」、「德藩藏書」印記。此書今日已非稀見之物，若是在二十世紀初，即使是中國學者要想尋覓，也是大為不易。

這三種中，有兩種原是德藩舊物。德山毛利元次，是江戶時代德山藩的第三代藩主，亦以藏書著稱。其所藏漢籍有一千餘部兩萬餘冊已歸宮內廳書陵部。但仍有部分存於德山市之棲息堂文庫，今歸山口大學。其中珍稀戲曲文獻尚有以下數種：

明漱玉山房刊青山高士之《鹽梅記》二卷、明末刊《重訂元本釋義全像琵琶記（琵琶記大全）》二卷、明末四知館刊黃儒卿輯《新選南北樂府時調青崑》四卷、明刊《名家雜劇》三十卷、明萬曆間《容與堂六種

曲》。此《容與堂六種曲》與圖書寮所藏本相同，確實為李氏本人所評，而非後人託名。《名家雜劇》即《盛明雜劇》之別題。《鹽梅記》為世間孤本，經波多野太郎先生的提示，中山大學康保成教授訪得此書，已由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出版（一九九八）。

日本在德川幕府時代，除了屬於將軍府私人擁有的圖書館——紅葉山文庫最為有名之外，各地的「大名」（即諸侯）也多仿效德川幕府，設立私學，禮遇學者，蒐羅圖書文獻，形成自己的文庫，保存了許多重要文獻資料。前舉德山毛利氏、佐伯毛利氏即是如此。此外較著名者，尚有尾張德川氏、紀伊德川氏、長州毛利氏、加賀藩前田氏等。

名古屋的蓬左文庫，是以尾張德川家的舊藏書為主設立的公開文庫。德川家康晚年熱心傳承與振興學術文化，他從江戶城內富士見亭文庫移出部分藏書，在他所隱居的駿河（今靜岡），創設駿河文庫，藏書達一萬種。元和二年（一六一六），德川家康去世，其遺物分給尾張、紀伊、水戶三家。其中稱作「駿河御讓本」的三千冊藏書歸尾張家，以此為契機，形成了尾張藩的「御文庫」。御文庫致力於收集歷代藩主的舊籍，到幕府末期，藏書達五萬種。在江戶時代，尾張藩的御文庫成為日本首屈一指的大名文庫。明治維新後，文庫藏書約三分之一流失，為保存所剩書籍，明治末大正初設立蓬左文庫，轉輾定址於舊尾張德川家大曾根邸內。此文庫藏戲曲小說也頗有珍稀之物。其中萬曆間集義堂刊印之《重校琵琶記》，係「寬永十二年種村肖推寺獻本」，亦為孤本。

紀伊德川氏之藏書，今歸東京大學，為設南葵文庫，只是其中並無罕見曲籍。

東京的尊經閣文庫，是加賀藩前田氏的舊藏。始自藩祖前田利家的內室芳春院松子，經過第三代前田利

常的經營，至第五代前田綱紀而集大成。前田綱紀（一六四三—一七二四）曾邀集森下順庵（一六二六—一六九八）、室鳩巢（一六五八—一七三四）等江戶時代有名望的學者，一起商討學問，收集整理古文獻，以「好學的大名」而名聞於時。江戶大儒新井白石曾有「加賀乃天下之書府也」之評，並譽其為日本屈指可數之文庫。一九二六年建立獨立法人文庫，位於東京都目黑區駒場舊日前田侯爵舊邸。文庫內之珍貴曲籍有程萬里選《鼎鑊徽池雅調南北官腔樂府點板曲響大明春》六卷，為僅存之孤本，王秋桂編《善本戲曲叢刊》第一輯即據此本影印。

三

日本學府所藏戲曲，以東京大學與京都大學最為突出。

東京大學所藏，可分為三組。一是綜合圖書館所藏。其中有森槐南舊藏戲曲，多屬清人刊本，雖無罕見之劇，但其間丹黃塗乙，頗可見其喜尚。森槐南也是最早在東京大學講授詞曲的學者，鹽谷溫是其學生，因受其影響而從事戲曲研究。該館亦有數種今關天彭舊藏戲曲文獻，如明刊《嘯餘譜》等。該館所藏以乾隆鈔本《九宮正始》最為珍貴，與學界熟知之他種清鈔本間有歧異，兩相勘比，此著真面目始見。二是文學部所藏。有少量森槐南舊藏戲曲，如《畫中人》、《吟風閣》等。其中，明刊傅一臣《蘇門嘯》（含十二種雜劇）較為稀見。一九二七年二月，董康訪東京大學，通過鹽谷溫將此書借出影印，遂成易得之物。此外尚有多種珍貴曲籍的移錄、複製之本，如明徐奮鵬的《詞壇清玩》二卷，係鹽谷溫據宮原平民舊藏明天啓元年刊本影鈔，宮原氏之原本今不知下落，同一刊本此外僅中國國家圖書館有藏。三是東洋文化研究所之收藏。該所堪稱是日本收藏戲曲之最大寶庫。其收藏之戲曲資料，小部分承自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其中如《芙蓉屏